

## 与胡适之论词书

夏承焘

这封信是一九二八年八月四日起草、同月十九日发出的。当时我二十八岁，在浙江严州中学任教。授课之余，开始研究词学。胡适《词选》中的各词人小传，我都札入《词林年表》。胡著附《词的起原》，谓长短句起于中唐，考订颇确凿。胡著亦有数处可商榷，故写了这封长信与他讨论。如今偶于旧日记本中翻得此信，《文献》丛刊编辑同志认为它还有一得之见，那么便让它公开发表，以就正于并世的词学家们。

一九八〇年五月夏承焘记于北京

适之先生撰席：

顷读大著《词选·词的起原》篇，获益良多。“词的音调里仍旧是有泛声的”一语，尤有先得吾心之快。词中衬字，出于《泛声》，而清初人词书，皆以虚字当之，谓实字不可藉口为衬，——如卓人月《词统》举“纵”字，沈天羽举“这”、“那”、“正”、“个”等字；万红友且矢口不信衬字之说。承焘曩作《词有衬字考》时，未见大著，引方成培《词麈》及江顺诒《词学集成》诸说，证同一调中字数多寡不同，皆由于乐调有泛声，唱时可增减随意，以驳《词律》“又一体”之妄。愚者一得，据以自喜，乃不知大作已先发之。（拙作亦引《思帝乡》调为证，暗合大作。）惟大著主长短句起于词人依曲拍为歌词，不信朱子“后来人怕失了泛声逐一添个实字”之说；拙作则仍从朱子、沈括、胡仔之说，且以诗词曲三者之递变皆与衬字有关。臆妄之见，不知足当先生一晒否？兹奉上数纸，祈多多赐教。

又大作以长短句词调起于中唐，引刘禹锡集中“依《忆江南》曲拍为句”一语证据甚强。顷繙宋人笔记又得数说，可为尊见印证者：

（一）《蔡宽夫诗话》云：“大抵唐人歌曲，本不随声为长短句，多是五言或七言诗，歌者取其词与和声相叠成章耳。予家有古《凉州》、《伊州》辞，与今遍数悉同，而皆绝句也。岂非当时之辞为一时所称者，皆为歌人窃取播之曲调乎？”

（二）《梦溪笔谈》云：“古乐府皆有声有词，连属书之，如曰‘贺贺’、‘何何’之类，皆和声也。今管弦之缠声，亦其遗法。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，不复用和声。此格虽云自王涯始，然贞元、元和之间，为之者已多。”

（三）《茗溪渔隐丛话》云：“唐初歌词，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，初无长短句；自中叶以后至五代，渐变成长短句；及本朝则尽为此体。今所存者，止《瑞鹧鸪》、《小秦王》二阙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。《瑞鹧鸪》犹依字可歌；若《小秦王》必须杂以虚声，乃可歌耳。”

三条皆足助证大作“初唐盛唐乐府歌词都是五七六言绝律”之说。沈括、胡仔已言之明白如此，此说为必不可易矣。

《词源》云：“古之乐章、乐府、乐曲，皆出于雅正，自隋唐以来，声诗间为长短句。”此虽亦出自宋人，而概泛之语，不举实证，当不足翻前说。

尚有一事献疑者：大作谓“乐曲有调而无词，文人作歌词填进去，使此调因此更容易流行”，为唐人填词动机之一。王静安先生答先生第二书谓：“教坊旧有《望江南》曲调，至李卫公而始依此调作词；旧有《菩萨蛮》曲调，至宣宗时始为其词，此说似非不可通”云云。大作考《教坊记》之结论，亦谓“我们绝对承认调早于词。”但鄙意以为大作所谓“调早于词”，若指无名之调如《避暑录话》所记“教坊乐工每得‘新腔’必求（柳）永

为辞”之“新腔”则可。（“新腔”得柳词始有调名。）王先生所谓开元《教坊记》中之《望江南》、《菩萨蛮》曲调，至李卫公、宣宗时始有词，则窃不敢信。古人信有先制腔而后填词者，如杨元素先自制腔，而张子野、东坡填词实之，名《劝金船》；范石湖制腔，而姜尧章填词实之，名《玉梅令》等是。（引方成培《词麈》）然当有词以后，始得调名。一调之成，或先有词，或先有腔，而调名则当在有词之后。调名《菩萨蛮》，其初当有词咏女蛮国人“危髻金冠，瓔珞被体”之状。《忆江南》本名《谢秋娘》，其初李德裕当有词咏其妾谢秋娘。（据《乐府杂录》说）亦犹张志和《渔父》“道渔家之事”，张子野《师师令》“赠妓李师师”。《乐府杂录》、《碧鸡漫志》下逮杨慎调名原起之说，虽或不可尽信，而非尽不可信者。《词苑丛谈》谓“大率古人由词而制调，故命名多属本意。”若徒有腔而无本意之词，则《菩萨蛮》、《忆江南》之名何由来哉？（高似孙《唐乐曲谱·荔枝香》云：“贵妃生日，张乐长生殿，奏曲未有名，会南方进荔枝，因名《荔枝香》”〔注一〕，此先有曲而后有名；然不能必其曲为徒有腔而无词。）故鄙意疑古调所谓“有谱无词”，若《齐东野语》所称“南宋时修内司所刊《乐府混成集》，巨帙百余，古今歌词之谱，靡不具备，而有谱无词，实居其半”，其已有调名者，当是古有其词，而后亡之，非本无词者。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引俞少卿说，词调有一调数名者，“大抵一调之始 随人遣词命名，初无定准。”要当先有词而得名。大作及王先生所主“调早于词”，若谓已有调名之《忆江南》、《菩萨蛮》亦皆词在调后，窃以为未安〔注二〕。臆测如是，不敢以为必然。客处僻左，求书不易。王先生梁木已坏，无从请益。谨以俟教于先生。

又尊著于各词家小传，平隲作风，时有新解，如论东坡、论稼轩、论白石、玉田皆至佳；考证时代 亦有补于拙作《词林年

表》。惟第六篇评刘改之，谓其词“属于辛弃疾一派，直写感情，直抒意旨，虽不雕琢而狠用气力，”似犹以豪放目刘词。改之自有浓挚缠绵处，况周颐曾举其《贺新郎·赠张彦功》云：“谁念天涯牢落况？轻负暖烟浓雨，记酒醒香销时语。客里归鞚须早发，怕天寒风急相思苦。”前调云：“衣袂京尘曾染处，空有红香尚软，料彼此魂销肠断。”又云：“但託意焦琴纨扇，莫鼓琵琶江上曲，怕荻花枫叶俱凄怨。”《祝英台近·游东园》云：“晚来约住青骢，踏花归去，乱红碎一庭风月”数语。谓“此等句是其当行本色，蒋竹山伯仲间耳。其激昂慷慨诸作，乃刻意抚拟幼安，如《沁园春》‘斗酒彘肩’云云，则尤抚拟而失之太过者矣。”（《蕙风词话》二）况氏谓刘之词格本不同辛，颇有特识。大著能见到辛词永久价值在于“言情写景无不佳妙”之小令，胜悲壮激烈之长调，而于刘词似尚未见其全。况氏论词，时有腐论，如言守律有至乐之境（《词话》卷一第八页），初学词宜联句和韵（《词话》卷一第九页），作咏物咏事词须先选韵等是；即其论刘词忽涉及《词苑丛谈》载改之遇琴妖事，大发议论，谓：“《龙洲词》变易体格，迎合稼轩，与琴精幻形求合何异”云云，亦妄诞可笑。而此节谓刘之词格本不同辛，颇具独见。大著所选词，脱落故常，自标准则，允能“表现个人见解”，然于前人是处，似亦不可一笔抹煞。此为小疵，敢附求全责备之意，申论于此，倘亦不以为妄言乎？

敬颂著安不次

夏承焘启

注一：《荔枝香》云云，陈元龙《片玉集》注云，见《唐礼乐志》。《杨妃外传》亦云。

注二：《东坡乐府·醉翁操序》云，琅琊幽谷，山川奇丽，泉鸣空涧，……醉翁喜之，把酒临听，辄欣然忘归。既去十余年，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，以琴写其声曰《醉翁操》，节奏疏宕，而音指华畅，知琴者以为绝伦，然有其声而无其辞，翁虽为作歌，而与琴声不合，又依楚词作《醉翁引》，好事者亦依其辞以制曲，虽合韵度，而琴声为词所绳约，非天成也。后三十余年，翁既捐馆舍，遵亦没久矣。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，特妙于琴，恨此曲之无词，乃谱其声而请东坡居士以补之云。此先有曲后有词，但欧公当时已为作词。